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5.014

日记视域下王船山《读通鉴论》阅读接受史

赵斌^{1,2}

(1.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2.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从文人日记的相关记载看, 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后, 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一时间成了畅销书, 成了广受文人阅读的历史论著。《读通鉴论》的集中阅读时段是在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之后的同治年间、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戊戌变法前后, 随着西方侵略者入侵, 救亡图存成了时代唯一主题, 《读通鉴论》史学思想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 对晚清思想革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 每到历史转折时期, 《读通鉴论》都会成为热读书籍, 其流播也越发广泛。

关键词: 王船山; 文人日记; 《读通鉴论》; 阅读接受史

中图分类号: I24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5-0107-08

Reading Acceptance History of Wang Chuanshan's *Du Tong Jian L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ry

ZHAO Bin^{1,2}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cords in the diaries of scholar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inling Edition of *Chuanshan Yishu*, Wang Chuanshan's *Du Tong Jian Lun* became a best seller and a historical treatise widely read by scholars. The intensive reading period of *Du Tong Jian Lun* was during the Tongzhi period, the period 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o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1930s and 1940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inling Edition of the *Chuanshan Yishu*.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with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invaders, saving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became the only theme of the times.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Du Tong Jian Lun* was highly valued by people of insight at that time and became a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ideological innovation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udging from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Du Tong Jian Lun* will become a popular book at every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and its circulation will be more extensive.

Keywords: Wang Chuanshan; diaries of scholars; *Du Tong Jian Lun*; reading acceptance history

收稿日期: 2024-03-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人存世日记的发掘、整理与研究(1897—1927)”(19YJC751071)

作者简介: 赵斌, 男, 安徽霍邱人, 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读通鉴论》创作于1687年,是王船山晚年阅读《资治通鉴》的心得语录。舒士彦说:“船山史论两种,成于最晚之岁,盖读史有感,随事触发……而于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均有论列。”^[1]其“史论两种”是《读通鉴论》与《宋论》,“两书虽然是王夫之晚年‘无意为文’之文,但皆成为探历史得失,明兴亡之故的史评名著”^{[2]32}。《读通鉴论》以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为蓝本,对其中的部分历史事件、人物等予以评说,引出或发表见解。

一直以来,学界对《读通鉴论》中的进化史观有较深入的研究。宋小庄认为,王船山“对历史观的主要课题都进行了探索,并给予回答。对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他以进化史观和治乱分合史观来解释……达到我国当时历史哲学的最高峰”^[3]。这一评价很高,也是不少学者的共识。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尝试从日记视域这样一个特殊角度,探索《读通鉴论》的阅读接受史及其思想意义。

一、《读通鉴论》阅读史

1976年9月8日,赵景深在日记写道:“沈龙法来,请他陪我到古籍书店去买了刘禹锡和魏源的集子以及王夫之的《读通鉴论》。”^[4]这说明《读通鉴论》一直是学者的重要阅读书籍,而能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购得此书,足见《读通鉴论》的影响力。

据刘荣考证:“《读通鉴论》实正式面世于1865年。”^[5]刘氏是根据王之春所作《王夫之年谱》而得出的结论。年谱写道:“曾文正公国藩与弟忠襄公国荃,重刻前十七种于金陵,刻增……《读通鉴论》。”^[6]事实并非如此,道光年间,《读通鉴论》随老版《船山遗书》已经刊刻。可能是因为邓显鹤等编撰的《船山遗书》因版毁而留存数量不多,致使王之春在年谱中几乎没有提及老版的《船山遗书》,并且很多人也认为邓显鹤等人只刊刻《船山遗书》150卷。实际上,邓显鹤在150卷之外又增刻了《读通鉴论》等王船山作品。正如邹汉勋信中所提及:“《读通览论》四册,《宋论》四册,约五六十万言;晓岑怱怱半溪,欲其陆续付梓。勋恐其不能为力,又身在局中,不便赞成。如何如何?”^[7]邓显鹤、邹汉勋等编撰者开始没有把《读通鉴论》这部含有“夷夏之防”等敏感

话题的史论列入出版计划是有所顾虑的,而当欧阳兆熊提出增刻《读通鉴论》时,他们虽然依然有所顾虑,但还是把《读通鉴论》刊刻出来了。下文所论及的赵烈文等阅读《读通鉴论》的时间是1858年,此时,金陵版《船山遗书》还没有刊刻。所以,《读通鉴论》正式面世应该是道光年间,而不是同治年间。

因老版《船山遗书》版毁而流布有限,所以,学界集中阅读《读通鉴论》的时间是在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之后。曾国藩阅读《读通鉴论》与刻印《船山遗书》有密切关系。其阅读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862年10月27日至11月29日^[8],阅读了一个余月,其主要是为出版《船山遗书》做准备工作。第二阶段是在1866年1月28日至8月3日,其阅读时间跨度较长,主要是为校定《船山遗书》而阅读。1866年8月3日,曾国藩日记中写道:“早饭后……阅读通鉴论二十五页。凡三十卷阅毕。酷热之后,继以疾病,涉猎一过,校出错字甚少。”^{[9]256-317}说明《读通鉴论》的编校质量较好。

1867年,《船山遗书》出版,《读通鉴论》一时间成了畅销书。王文韶是曾国藩的门徒,其1867年就获赠《船山遗书》,但1876年才开始阅读。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庚虞,又号退圃,浙江杭州人。1867年8月王文韶获赠《船山遗书》时,还在湖北安襄荆郢道盐运司任上,后擢湖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1871年至1878年,其出任湖南巡抚,后调任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兵部侍郎、云贵总督。王文韶仕途顺利,受曾国藩影响,其处理政事之余,坚持读书。王文韶阅读《读通鉴论》开始于1876年1月28日,日记写道:“竟日无事,阅王船山《读通鉴论》三卷。”^{[10]353}结束于1876年3月17日,日记写道:“阅史论第三十卷五代下。并卷末。叙论四又一段。”^{[10]353}一个多月的时间,共有23次阅读记录,阅读中断较少。其阅读中断的原因大都是因为政务特别繁忙,无暇读书。如1876年3月3日,“见客二起,丽生挈眷抵省。拜发奏报楚军合剿黔匪攻克南江水口坚巢折,四百里由驿”^{[10]370}。发生“匪乱”,自然是紧急事件,所以王文韶这一天没有读《读通鉴论》。《船山遗书》中的《读通鉴论》全书共30卷,卷末附《叙论》4篇。从王文韶日

记可以看出，其把《读通鉴论》读完了。遗憾的是，其阅读体悟日记中几乎没有记录。

比王文韶稍稍晚一段时间，姚永概更仔细地阅读了《读通鉴论》。姚永概（1866—1923），字叔节，安徽桐城人，出身于诗宦之家。1894年，姚永概师从吴汝伦。吴汝伦为曾国藩四大门人之一，倡导时务新学。姚永概与王文韶不同，王文韶是以政治家身份读《读通鉴论》，姚永概则是以学者身份阅读《读通鉴论》。姚氏阅读《读通鉴论》始于1887年2月26日。日记写道：“校《读书偶识》五十二页……看王船山《读通鉴论》十二页。”结束于1887年3月29日，日记写道：“校《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四页、《尔雅匡名》十五页……看《读通鉴论》四十六页……看《汉书》列传数篇。”^{[11]291-325}约一个月的时间，共有25次阅读记录，其阅读基本是连续的。青年姚永概阅读《读通鉴论》时是在中举前，当时姚氏还没有投入吴汝伦门下，其受曾国藩的影响不多，但从日记可以看出，《读通鉴论》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文人们纷纷主动阅读接受《读通鉴论》。另外，姚永概作为读书人，不同于政治家王文韶，其把《读通鉴论》与《春秋三传异文释》《释服》《释谷》《孟子音义考证》《诗古微》《左传异文释》《尔雅匡名》《尚书集解》《汉书》等经典著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阅读；或者说，他是把《读通鉴论》当作经典论著来阅读的。更为重要的，姚永概阅读《读通鉴论》，有心得和评价。

孙宝瑄阅读《读通鉴论》比姚永概晚了十来年，而这个十来年是中国近代思想的重要转型期。因时代不同，孙宝瑄与姚永概阅读《读通鉴论》的体悟不一样。孙宝瑄（1874—1922），字仲巧，浙江钱塘人。孙宝瑄阅读《读通鉴论》起始于1903年2月25日。日记写道：“余素恶王安石、张居正皆祖申、商之言，其学术卑不足道，而世无以余言为然者。船山竟先得我心，其《通鉴论》曰：申、商者，乍劳长逸之术也。”^{[12]636}结束于1903年5月7日。日记写道：“船山语录摘抄。”^{[12]670}其阅读时间跨度长，但中间不太连续。孙宝瑄是支持戊戌变法的。变法失败之后，孙宝瑄阅读王船山《读通鉴论》的目的是反思历史，寻找历史的出路。民国前，晚清文人阅读王船山《读通鉴论》的还有夏敦复、王闿运、谭献、郭嵩焘、赵烈文、

周腾虎、江瀚、缪荃孙等，后文会有具体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从日记视域看，阅读《读通鉴论》的主要是近代文人，杨昌济、钱玄同、刘节等现代文人对《读通鉴论》也有较仔细研读。杨昌济应该是抱着研究的态度去阅读王船山《读通鉴论》的，其日记中留下的相关记录不多，只有2条。日记写道：1916年9月13日，“意欲将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五帝纪年中之事，依序细解一过，即取王船山读通鉴论，宋论中凡高帝、光武、太宗、太祖卷中者，亦依次细解一过”；9月21日，“连日总不爽快，亦不过解诗经、解通鉴、写解经日记、写解通鉴日记、写日记五者为之崇耳”。杨昌济是精读《读通鉴论》，而且还写“解通鉴、写解经日记、写解通鉴日记”^[13]。钱玄同更是抱着研究态度阅读《读通鉴论》，其日记写道：1933年1月16日，“访建功，并晤乐夫[残]旭生，大谈学问，他说，王船山的书，以《春秋口口》《读通鉴论》《宋论》三书为最于[残]……此论甚精”^{[14]901}。因有人推荐《读通鉴论》，钱玄同于1933年2月10日“北大开学”时，“至北大圃（图书馆），拟借佳本《船山遗书》，检其各书之序所记年月，因后来印书往往缺序，或张冠李戴，而我的一部，黑色纸张虽非极劣……旭生谓《读通鉴论》与《宋论》见解最高明，当是暮年之作。我读其子之行述中，徐言甚信，但亦不详其年代也”^{[14]902}。北大图书馆中的《船山遗书》是残本，不全，这也说明阅读王船山作品的人数有限。当然，一些书局还是可以买到《读通鉴论》等船山作品。可能因为北大借出的《读通鉴论》残破，钱玄同又在书局买了一些船山作品，其1933年2月13日写道：“至直隶书局取《通鉴》附属之数种。”^{[14]911}

到了20世纪40年代，刘节对《读通鉴论》的阅读也较仔细。刘节（1901—1977），字子植，温州朔门人，当代历史学家。刘节阅读《读通鉴论》起始于1945年5月3日，日记写道：“读通鉴论二页。”结束于1945年8月3日，日记写道：“读通鉴论至卷终。”共有24次阅读记录，时间跨度长，中间不太连续。刘节阅读王船山《读通鉴论》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其日记写道：1945年8月10日，“上午接仲博一函。下午读通鉴论。晚八时许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举世欢腾。计自

卢沟桥事变以来适八年又一月又三天。”^[15]时代不同,刘节对《读通鉴论》的阅读、评价与前人也有所不同。

二、《读通鉴论》评价史

《读通鉴论》出版后,因史论价值高而备受文人推崇。《读通鉴论》不同于王船山早期的《礼记章句》《张子正蒙注》等偏重于“道统”的经学之作,其是偏重于“治统”的史学之作。据现有日记文献,比较详细阅读《读通鉴论》的文人是曾国藩,但曾国藩日记很少记录其阅读《读通鉴论》的心得体会。曾氏没有对《读通鉴论》进行过评价,而对《礼记章句》《张子正蒙注》评价较多。曾国藩认为,“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书”,其“礼记章句为先生说经之最精者”,并因为王船山“说礼多通于性命之原,故急取中庸阅之”^{[9]286-306}。由此可看出,曾国藩比较看重王船山《礼记章句》《张子正蒙注》等“道统”作品,而对《读通鉴论》等偏重于“治统”的作品不太推崇。

曾国藩门人赵烈文对《读通鉴论》特别推崇。1858年12月9日,赵烈文“在弢甫处读明王夫之而农《读通鉴论》,为书三十卷,沉雄博大,识超千古。王明季遗民,入清,隐居而终”^{[16]42}。当时,《船山遗书》存本十分珍稀,而“《王夫之全书》在家伯厚兄处,弢甫自索不获,何论其他”^{[16]79}。1859年8月2日,赵烈文又读《读通鉴论》,称道“此书议论精深,博大其中,切理厌心者不可胜”,“此书议论精深博大,其中切理厌心者,不可胜录。是时至十一月,吾读之二过,未终,为金眉生借去”^{[16]79}。赵烈文等人争阅《读通鉴论》,对《读通鉴论》评价特别高。后来,可能受曾国藩“道统”思想的影响,赵烈文对《读通鉴论》有所保留,其日记写道:1860年2月18日,“读楚元王传:曾孙德,元孙向,向子歆。王夫之读通鉴论言向极谏封事,不当言援引宗室,类自为谋,授人以隙。窃以向睹王氏之强,思树宗室,以为援击,惴惴至诚,为社稷计利害,何暇避嫌,此论褊矣”^{[16]115}。7月23日,“读李广苏建传:广孙陵,建子武。广简易不用部曲,盖以军行绝漠,士卒劳苦,可以休息,使士气常逸;此亦兵家宜有,然所以能如此者,以斥候远、耳目明耳。程不识所行,自是将军常法。此各有所见,所谓运用之妙,存于

一心,难以优劣论之。明人王而农以为李攻兵而程守兵,甚非”^{[16]167}。在此,赵烈文改变了早期对《读通鉴论》“沉雄博大,识超千古”的超高评价,辩证地指出了《读通鉴论》的偏执之处或错误之处。可能受到赵烈文的影响,周腾虎几乎在相同时间作出了几乎相同的评价,其日记写道:1860年12月3日,“王夫之论贾谊、陆贽、苏轼,虽有深义,然诋苏过甚,非笃论也。苏恺弟爱人,惟学识浅薄,未能免俗耳。假使秉政,可与韩、范、富、欧为伍,不为王荆公也。荆公气悍而不晓事,固执而不回,所以成其败。轼知变通,若使当局,亦不过因世随时,无能为大功业耳。若如夫之所言,则几如小人之尤,何至是耶?学者论古人,往往失其平放,不能履服千古耳”。第二天,“经日阅王夫之《读通鉴论》,持论明通,庶为知言。言匹王佐之才,世不多见,可尚也”^{[17]131}。周腾虎对《读通鉴论》的评价一分为二,比较客观。

纵横家王闳运对《读通鉴论》的评价特别低,其日记写道:1869年1月17日,“点汉书一卷。王章上书攻王凤,而欲立定陶王,逢帝一时,终犯其忌,其死非不幸。赵合德自杀不对状,后乃诬成其杀子,非信史也。王船山以耿育所奏为非,谬矣。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矣”;2月8日,“阅晋志三卷,律历不能明也。王船山讥陈卧子三月而毕二十四史,以为置诸志不观,宜其迅疾。虽然,不明占候推步,则观之三年亦犹一览耳。诚早通之,何不可一日而了?故知船山语似精而粗”^[18]。王闳运认为,船山《读通鉴论》有点标新立异,立论随便、粗糙,缺少严肃的历史态度,他因此对船山史论评价很低。但同一时期的谭献,对王船山《读通鉴论》评价很高,与王闳运形成鲜明对比。谭献日记写道:1876年,“阅船山《读通鉴论》五代二册。又阅《绎志》十二篇,至《辨奸》,凡三卷。如王氏之骏厉、胡氏之温醇,固楚学之大宗也”^[19]。谭献认为,《读通鉴论》“骏厉”,并因《读通鉴论》而“固楚学之大宗也”,对船山学推崇备至。无独有偶,名士翁同龢也在其1877年4月1日的日记夸赞道:“读王船山《通鉴论》,如对故人。”^{[20]1306}看来,王船山的历史观越来越符合时人的口味。

《读通鉴论》道光年间出版后，光芒渐显。随着西方侵略者入侵，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唯一主题。在时局影响下，《读通鉴论》的史学思想为时人所重，化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对晚清思想革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孙宝瑄等文人从《读通鉴论》中获得了许多历史借鉴，对《读通鉴论》的史学功用做了深入挖掘。孙宝瑄的日记写道：

4月26日，读船山《通鉴论》。船山于唐魏玄同之请复辟召，杨绾之请复孝廉，皆痛斥之，以为断非三代以下所能行。如欲行之，必反封建之天下而后行。其识可谓伟矣。船山曰：穷则变，未有既变可使复穷者。然哉！

4月27日，船山云：言者所以正人，非所以正己。己有馀而不忍物之不足，则出其聪明，以启迪天下之昏翳，而矫之以正。子不忍于父，臣不忍于君，士不忍于友，圣人君子道不行而不忍于天下后世。忘山曰：……不德者多而天下乱，于是圣人不得已出而救民之危，于是有功。不德者多而斯民愚，圣人不得已出而辟民之聪，于是有言。由是观之，立功、立言，皆出于不得已也。出于不忍，非好为之也。使天下无功可建，无言可说，圣人求之不得矣。

5月2日，船山论第五琦、刘晏二人……税敛愈重，愈足导民于勤，民勤则富，赋虽重无所苦。船山论事，仍不免文家积习，非精确之语也。

5月4日，船山先生云：三代以下，选举渐变，而科目专以文取士，亦不得已之故也。盖谓以文取士，而得伪饰之文；以行取士，而得伪饰之行。然而伪行之害甚于伪文……船山之意如此，亦可谓有闾识矣。

5月6日，船山云：人之善疑也，盖有二种：一刚而责物已甚则疑，一柔而自信无据则疑。两者异趋同归，以召败亡，一也。刚不以决邪正，而以行猜忮；柔不安善类，而以听谗谀。是为两失。

5月7日，孟子曰：得乎丘民为天子。船山以为，此三代之馀风教尚存，人心犹朴，直道不枉之世乎！后世教衰行薄，私利乘权，无不可爵饷之士，无不可利讹之人，邱民又恶足恃哉！盗贼可君，君之矣；妇人可君，君之矣；夷狄可君，君之矣。旦与之食；而且讴歌之；夕夺之，而夕诅咒之。恩不必深，怨不在大。忘山曰：由是以观，则民权

之未能骤用，抑可思其故矣^{[12]636-670}。

《读通鉴论》虽然以《资治通鉴》中的人和事为评论依据，但它的内容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资治通鉴》的范围。全书上挂下联，既联系到战国以前之事，也联系到了五代以后宋元明三朝之事，尤其是明代史事，几乎每卷或明或暗都有论及，如：“自以身丁末运，明帜已易，禹甸为墟，故国之痛，字里行间，尤三致焉。”（《〈读通鉴论〉校点例言》）“故一部六十万字的《读通鉴论》，与其说是在论历代兴亡之事，不如说是对明朝遭亡国之祸作全面而深刻的反思，所谓痛定思痛，正是王夫之撰写此书的苦心孤诣所在。”^{[2]32}从孙宝瑄日记看，孙宝瑄读王船山作品集中在戊戌变法前一年的1897年和“庚子之乱”的1903年。这个时间段是中国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两个时间点，孙宝瑄的思想也有很大不同。1897年，他受宋恕的影响，主要阅读王船山《黄书》，从“览船山先生《黄书》”而提出“吾重在君民之隔，船山重在夷夏之失防”的观点^{[12]128}。不过，他对王船山“夷夏之防”的观点有所保留。孙宝瑄是半新不旧的文人。1897年的孙宝瑄与宋恕、梁启超联系紧密，具有“维新变法”的进步思想，也具有“保皇派”的落后思想，也就是说他对清政府还抱有幻想。“庚子之乱”之后的1903年，孙宝瑄再次阅读王船山《读通鉴论》，其对王船山“夷夏之种界辨之甚严”的思想颇为欣赏，认为“论断新”。王船山认为：“夷狄阑居塞内……使与民杂居，而祸烈矣。”^{[2]1}即他认为夷夏杂居危害大，要保持华夏民族的纯洁性，必须保持夷夏之防。1903年，孙宝瑄开始重新审视当前时局与“治乱”历史的关联，对清政府非常失望。孙宝瑄从《读通鉴论》得到很多启示，王船山仁政、民本思想“深得他心”。他认为，王船山“所见不为无识”“其识可谓伟矣”“可谓有闾识矣”，最后得出了“民权之未能骤用，抑可思其故矣”的历史性反思^{[12]636-670}。可见，戊戌变法前后，孙宝瑄等文人越来越重视挖掘《读通鉴论》的思想资源。

和孙宝瑄一样，戊戌变法之前，姚永概对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夷夏之防”观点有所保留。其日记写道，1887年3月6日，“盖船山先生深恨外戚之祸人家国，故不觉有言之过当者，而此抑何过当之甚也？”追根溯源，“王船山《读通鉴论》

谓谢出晚年之诣阙,自陈为其子弟所逼,因叹人子孙之累甚大。船山借以立论可耳,其实不然”。然而,《读通鉴论》“虽间有过激之语,然言处乱世之道独为切至,至于国家大政,亦能通达利弊之原,不矜矜于小惠者,可谓大儒矣”。他进而得出同时代的“《识斋文集》”虽“文笔甚畅,议论有近乎偏激处,是其境使然,但颇以名自喜,则不及王船山矣”^{[11]292-374}的结论,对《读通鉴论》总体评价较高。

孙宝瑄等文人对《读通鉴论》的评价越来越高,与梁启超、章太炎等维新革命派文人对《读通鉴论》的看重不无关系。康有为曾经认真研读过船山著述,认为“王船山已发明旧制、旧俗之大义”。“王君作《通鉴论》,尚发出春秋不如后世之说”^[22]。他以此推广变法改制思想。梁启超也认为“《读通鉴论》《宋论》两编,史识卓绝千古,其价值至今日乃大显”^[23],因为,“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以后,一般社会所最受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所以给晚清青年的刺激极大”^[24]。章士钊更是认为,“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25]。可见,《读通鉴论》等王船山史学著作因为富含“民权”“民族主义”思想,对时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徐旭生等对船山《读通鉴论》也非常推崇。钱玄同日记写道:1933年1月16日,“晚七时访建功,并晤乐夫[残]旭生,大谈学问……他说,王船山的书,以《读通鉴论》《宋论》……甚精”^{[14]901}。1933年2月10日,“旭生谓《读通鉴论》与《宋论》见解最高明,当是暮年之作。我读其子之行述中,徐言甚信,但亦不详其年代也”^{[14]910}。徐旭生对《读通鉴论》等王船山作品评价很高,钱玄同也认同徐旭生的观点。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在20世纪20年代对王船山就有所研究,1922年发表了《王船山的道德进化论》^[26],按照五四时期流行的西方进化学说对王船山道德论进行阐述,推介其思想学说。青年时期的徐旭生读到《船山遗书》后,激发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后来回忆说:“对于我个人影响之大,再没有超过于《读通鉴论》《宋论》《史业导言》以上者。”^[27]由此可见《读通鉴论》对现代文人的影响之大。

当代文人对《读通鉴论》依然喜读、推崇。吴宓日记写道:1959年1月27日,“读王船山《读通鉴论》”。1961年9月11日,“访郑之蕃(桐荪,年七十五岁)于成府书铺胡同二号宅,须发皆长而华白,但瘦颀而老,相见甚欢……郑公发愿欲读毕二十四史,今已读至明初。又述治史之王赵钱氏要籍,尤重船山《读通鉴论》;又论中国史例之善,足见郑公史学用功之深且勤也!”^[28]日记记录了吴宓本人读《读通鉴论》的情况,也记录了郑之蕃对《读通鉴论》的推崇。郑之蕃(1887—1963),字桐荪,别号焦桐,数学家,文史家,是南社早期的社员。郑氏喜读二十四史,更是把《读通鉴论》排在史论首位,对其推崇备至。

三、《读通鉴论》传播史

思想传播依赖于书籍出版,没有公开发行的著作,思想传播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近代早期的王船山思想传播与邓显鹤等文人对船山著作刻印、发行有关。魏源作为湖湘文人,又曾经是岳麓书院的学子,其接触船山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更为关键的是,魏源与邓显鹤等船山著作编撰者关系密切,因而,魏源“获得一条接触船山思想的重要途径”^[29]。另外,魏源“在邓搜访湘籍名贤著作的过程中予以帮助,魏源是较早接触到船山思想并在船山思想影响下从事学术活动的”^[30]。王船山《诗广传》对魏源影响深远,魏源著《诗古微》摘引、论及《诗广传》的内容有10来处,其文中注有“此卷皆取衡山王夫之《诗广传》”等文字说明。魏源在《诗古微目录书后》特别注明:“得乡先正衡山王夫之《诗广传》,虽不考证三家,而精义卓识,往往暗与之合。左采右芼,触处逢原,于是《风》《雅》《颂》各得其所。”^[31]由此可见船山思想对魏源影响深远。

周腾虎因魏源而读《读通鉴论》。周腾虎日记写道:1858年12月3日,“余阅魏默深先生所撰《诗古微》,始识王夫之之学问。《古微》后所引其说深远,非浅学者所能。后至曾公营中,询郭筠仙嵩焘太史,始悉夫之之为。急欲得其书,遍求不得。此来与左太守仁。往来,伊家有其书,因假得之。六经、四书皆有讲义,通会汉、宋,而出以己见,实名世大儒也。其《(读)通鉴论》,尤明通有特识。篷窗无事,翻阅殆遍。学者论古人,

往往失其平放，不能履服千古耳”^[17]^[31]。周腾虎因读魏源《诗古微》而“始识王夫之之学问”，对《诗古微》所引用的船山学说赞叹不已。他随后咨询了郭嵩焘等文人，进一步了解船山其人。他到处搜寻船山著作，但当时船山著作流播有限，“遍求不得”。最后在湘乡人左仁（1802—1860，原名辉春，字子仁，号青峙、青士，湖南湘乡人，道光八年举人）家中借到了船山作品。按说，郭嵩焘应该有船山作品，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在曾国藩军营中，没有把书籍带在身边；也有可能他真的没有，因为当时要获得王船山的作品特别困难。

赵烈文因周腾虎而读《通鉴论》。1858年12月9日，赵烈文在周腾虎处初次接触到王船山著作：“在弢甫处读明王夫之而农《读通鉴论》，为书三十卷，沉雄博大，识超千古。”1859年8月至11月，赵烈文又读《读通鉴论》，称道“此书议论精深，博大其中，切理厌心者不可胜录”^[16]^[42]，读之二过未终，复为金安清借去。说明《读通鉴论》流播较为广泛，文人们争相阅读。1861年3月26日，赵烈文追忆说：“癸丑年遭乱，吾时年二十二岁，遂辍举业，稍探古学，常请益于族兄伯厚先生（赵振祚）及诸友人周君弢甫（周腾虎）、刘君开孙（刘翰清）、龚君孝拱（龚橙），至今稍有知识，二三子与有力焉！”^[16]^[42]而《读通鉴论》自然成了这个文人群体的热读作品。

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之前，《读通鉴论》很难寻到。曾国藩早期对《读通鉴论》也特别感兴趣。1847年，欧阳兆熊寄书曾国藩，并透露一个消息：“船山遗老续刻有《读通鉴论》，融贯列代事迹，发为传论，深资治理，不似胡致堂之专以坐谈取快，而为文浩博无涘、自成一子，不知其为庄骚、为史汉也。”^[32]曾国藩随即请欧阳勋（1827—1856，欧阳兆熊之子）为其代购一部。其在信中写道：“王船山《通鉴论》已刷出未？告为代觅一部，行纳价付意城处也。”^[33]“《通鉴论》”即《读通鉴论》，很多文人日记省略一个“读”字，造成歧义。《读通鉴论》一时间供不应求，曾国藩获得《读通鉴论》也是在几年后。1863年1月27日，郭嵩焘日记写道：“邀集郁泰峰、李绍周、王敬亭、杨药芳、周桂午小酌。泰峰求观通鉴论，因言嘉定严永思衍著有通鉴补正一书，至今未刊行也。”^[34]当时有关《读通鉴论》相关资料太少了，

不能满足文人阅读的需求。

在曾国藩等主持的金陵书局出版《船山遗书》之前，《读通鉴论》可谓一时间“洛阳纸贵”，阅读者特别有限。时人翁同龢也是寻觅《读通鉴论》多年后才买到。其在1864年2月18日的日记感慨道：“购得王夫之《读通鉴论》，此书求之数年矣。”^[20]^[33]1895年12月3日，江瀚也在日记写道：“以王而农《读通鉴论》交费绍麟寄傅生。”^[35]1911年10月15日，朱峙三在日记中写道：“清晨，默记湖堂未携出之书，有《船山遗书》四种，《读通鉴论》一套，《草字汇》大板的一套。”^[36]可见《读通鉴论》在当时仍然是稀罕物。相对于翁同龢，王文韶是幸运的。1867年8月10日，王文韶在日记写道：“九帅赠《船山遗集》全部共八套，以经史子分编，船山先生姓王名夫之，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崇祯年举人也。”^[10]^[40]“九帅”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是早期金陵书局的实际组织者。

“《船山遗集》”是指金陵书局出版的《船山遗书》。实际上，在1867年，王船山的作品流通不广，一书难求。戊戌变法之后，由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读通鉴论》的复刻非常火热。据学者考证：1900年，邵阳经元书局、邵阳澹雅书局、湖南大文书局、湖南书局等书局都刊刻了《船山史论》四种五十二卷，包括《春秋世论》五卷、《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1902年，上海慎记书局刊刻《读通鉴论》三十卷；1905年，上海环地福书局刊刻《读通鉴论》三十卷^[37]。这一时期，《读通鉴论》成了“显学”，特别受追捧。

这一时期的林传甲特别推崇王船山《读通鉴论》，对此书做过系统阅读、研究。1900年，林传甲担任湖南学政吴树梅幕僚，并为其孙授课，他推介《读通鉴论》作为孩子的阅读数目。其致吴凤慈（吴树梅之子）的信中写道：“令郎绍元应郡县童试高标，可喜。但近日弟于别后，文字略有寸进思见……绍元目下应熟读之书，第一为《三才略》，第二为《三通》序，第三为《方輿纪要》各省小序；应翻阅者，第一为《御批通鉴辑览》（抄录其批牒亦增见识）《四书古注》《钦定七经》；应摘读者，第一为王船山《读通鉴论》《古文辞类纂》；应涉猎者为《地理问答》《万国史记》《格物入门》。”^[38]他认为，《读通鉴论》是首先应

该摘读的书籍,对《读通鉴论》特别予以推介。

对《读通鉴论》思想方法的借鉴是更深层次的船山精神传播。姚永概日记写道:1887年10月16日,“予仿王船山《读通鉴论》而加以考证《惜抱诗笺注》”^{[11]325}。能借鉴《读通鉴论》考证方法做学问,其阅读可谓深入到了船山思想的深邃处。民国期间,《读通鉴论》被选编进入课本。姚永概日记写道:“1915年10月25日,上课。改文。选船山《通鉴论》。”^{[11]341}《读通鉴论》进入了学堂,走进了课堂,《读通鉴论》的流播也越来越深远。当时,稽文甫先生慨叹:王船山的著述,“在清朝埋没了许多年,最初得到赏识的只是和当代那种考据学风相适合的几种‘稗疏’,而这实在不过是船山学术的绪余”^[39]。随着清政府文化政策慢慢放开,《读通鉴论》《宋论》等船山史学著作陆续面世,王船山思想也流布得越来越广。可以说,《读通鉴论》的出版、阅读与传播对近代船山学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 王夫之.读通鉴论[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13:4-5.
- [2] 胡晓明.《读通鉴论》二题[J].船山学刊,2010(2).
- [3] 宋小庄.读《读通鉴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70.
- [4] 赵景深.赵景深日记[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58.
- [5] 刘荣.王船山《读通鉴论》考论[J].东方论坛,2015(2):33.
- [6] 王之春.王夫之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9:131.
- [7] 王船山.船山全书16[M].长沙:岳麓书社,2011:414.
- [8]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二[M].长沙:岳麓书社,2015:358-368.
- [9]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三[M].长沙:岳麓书社,2015.
- [10] 王文韶.王文韶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1]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M].合肥:黄山书社,2010.
- [12]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13]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193-194.
- [14] 钱玄同.钱玄同日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15] 刘节.刘节日记1939—1977:[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244-262.
- [16]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3.
- [17] 周腾虎.周腾虎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
- [18]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6:6,17.
- [19] 谭献.谭献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210.
- [20]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M].上海:中西书局,2012.
- [21]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4.
- [22]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53,559.
- [2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7-108.
- [2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91.
- [25] 章士钊.王船山史说申义[M]//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59:731.
- [26] 徐旭生.王船山的道德进化论[J].哲学,1922(5):36.
- [27]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1.
- [28] 吴宓.吴宓日记续编4[M].北京:三联书店,2006:23,177.
- [29] 方克立、陈代湘.湘学史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647.
- [30] 秦世龙.魏源思想的理学渊源:以湖湘实学为视角[J].学术界,2016(5):171.
- [31] 魏源.魏源全集1[M].长沙:岳麓书社,2004:697,736.
- [32] 欧阳兆熊.寥天一斋文稿[C]//《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2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2.
- [33]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5[M].北京:中国书店,2010:30.
- [34]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2[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5.
- [35] 江瀚.江瀚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33.
- [36] 朱峙三.朱峙三日记[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05.
- [37] 刘志盛,刘萍.王船山著作丛考[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48-56.
- [38] 颜世明,刘兰芬.李盛铎、萧大猷、林传甲书札四通:清末书法家吴树梅门生手札研究之二[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6):75.
- [39] 稽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62:1.

责任编辑:黄声波